

1. 2003年3月24日出版的《商業周刊》(第800期)，主筆郭奕伶在名為「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調查報告中，描述了豆豆與小如的生活。請你先閱讀這部分的內容：

清晨七點鐘，豆豆剛聽完「大家說英語」後，與父母共進早餐。餐桌上有爸爸的《工商時報》、《經濟日報》，媽媽的《中國時報》、《聯合報》，以及他的《國語日報》。今天，他們的早餐話題是股利發放。

就讀私立復興小學六年級的豆豆，父親是晶磊半導體公司董事長關恆君、母親是電視台主播蔣雅淇、祖父是前中油公司總經理關永實，舅舅則是ING安泰人壽資深副總經理蔣國樑。

豆豆的家，就在台北市敦化南路上的高級住宅區八樓，沿著街道的一長排台灣樟樹。人們經過時，總愛抬頭仰望那一片綠，然而，那只是豆豆家外的景觀，他只需低頭俯視。

豆豆是個大忙人。放學後，媽媽為他安排了生物、數學等補習科目，為進入國中一年級提早做準備；至於英文課，從幼稚園起，豆豆就已經上了九年。

最近，豆豆還忙著參加科學展覽比賽，家教老師是大同工學院的大學生，曾經在全國科展得獎。擁有美國史丹佛電機博士學位的爸爸說，這是要培養他實驗的精神，從挑題目、思考，到解決問題。

除此之外，豆豆剛完成一本與媽媽共同創作的書，書名是《打造資優小富翁》，豆豆的志願是成為一個像爸爸一樣的成功企業家，他買了一本參考書《十九歲總經理》。

這是知識菁英養育小孩的方式，重點不在不虞匱乏的金錢，而是錢買不到的國際觀、資訊流、正確態度、思考決斷力……豆豆，已經贏在人生的起跑點。

一樣是清晨，南投縣名間鄉的小如，正準備跟五十二歲的爸爸去田裡工作。從出生以來，小如多數的時間都在田裡度過。即使豔陽高照，六歲的她仍然打著赤腳來回田埂間，幫爸爸扛著農作物。除了黝黑的臉，她還有滿身的泥巴。

七年前，小如的父親還是一個家境小康的農民，剛從越南娶妻回來。本以為那是一個幸福的開始，他於是大手筆舉債租地，投資種薑。

沒想到，採收前氣候反常，一場大雨淹沒了兩甲地的生薑，也淹沒了他的夢想。如今，他除了負債新台幣六百萬元以外，還有一塊不值錢的農地，與每個月超過四萬元的利息。

不管小如的父親如何努力，台灣的小農似乎總是找不到出路，從種生薑、鳳梨、茶，到檳榔、山藥，每年換得的現金不到二十萬元，連支付利息都不夠。以債養債的結果，就是負債持續擴大。這個黑洞，看不到盡頭。

每天，他們都擔心土地會被拍賣，到時候，他們將一無所有。土地，不只是他們棲身之地，更是唯一可以謀生的工具。

五個月前，從越南嫁過來的母親不告而別，把小如與四歲的弟弟信宏留給父親。這天起，小如越來越沉默了。

這一天，小如蹲在一排排的鳳梨前，許久不動，阿嬤不耐煩的問她，到底在做什麼？小如答：「我在問鳳梨，什麼時候長大？」

原來，小如看到同年紀的堂兄弟都已經上學，也很想上學，但是，爸爸告訴她，等鳳梨收割賣錢，才有錢給她上幼稚園。於是，她每天都看著鳳梨，告訴鳳梨要趕快長大。小如的起跑點，與豆豆差了十萬八千里。

台灣的貧富差距正以驚人的速度擴大當中，因而形成「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落差。

- (一) 可能有人看了這篇文章，認為豆豆與小如天壤之別的生活，「都是命啦」。對於豆豆與小如的落差，你可以就台灣社會的情境，以什麼樣的社會學觀點與分析，提出不同於「都是命啦」的解釋。(25%)
- (二) 有許多目前在台灣實施的社會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豆豆和小如現在、甚至未來的生活。例如「一個台灣，兩個世界」一文就以大學的學費政策來加以討論。請舉一個(只要一個就好)你所熟悉的社會政策來說明，你上述的社會學觀點與分析，如何能幫助我們評估該項社會政策的利弊得失？(25%)

2. 根據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目前每十對新婚夫妻中就有一位來自東南亞的「外籍新娘」，請用社會結構、文化、社會行動、權力這四項社會學概念來分析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50%)

請你先閱讀研究外籍新娘現象的社會學家夏曉鵬的敘述(女性身體的貿易，原載於騷動雜誌)：

近年來，隨著WTO對農業經濟日益逼近的威脅，以及勞力密集工業的大量外移，娶妻心切的臺灣農村青年數以千計地遠離了家園。在豪華的桃園國際機場，雄偉的波音客機和壯觀的候機室立即撩亂了他們的謙遜眼神；在他們抑鬱的生活裡，

這樣的遭遇畢竟不尋常。同時間，在南太平洋彼端，中介者及媒人穿梭在印尼雅加達的窮街陋巷，勸說年輕的小姐們參加相親。在相親的場合裡，男人的眼神急切搜索，女人靦腆害羞，而中介者則熱心地穿針引線。數天之後，成雙成對的男女舉行訂婚禮。訂了婚的男人回到臺灣往往須等上一年，才能盼到他的印尼新娘。這種國際婚姻的締結過程冗長而繁複，動輒耗掉一般農民家庭的大半積蓄。訂婚成功的男人付給中介者及媒人總共約新臺幣三十至四十五萬元，其中新娘家庭收到的聘金只佔十分之一。然而，這筆聘金對於生活費用低廉的印尼一般大眾而言，並非小數目（約等於二年薪資）。

台灣男子娶東南亞新娘的趨向與上述台資外流東協各國的趨向同步。根據婚姻中介和各報紙消息，泰國和菲律賓新娘在1980中期最為普遍。台灣駐印尼代表處資料顯示，自1991年開始，印尼新娘開始顯著增加。

在工業化、都市化和國際資本自由化的發展脈絡下，留鄉青年的弱勢不僅表現在經濟上，更表現在身份象徵上。他們身上帶著「沒有前途的人」的污名，因為鄉民們普遍認為他們在都市混不出名堂才回到鄉下。沒有女性願意嫁給他們；他們在心理上承受著苦楚。甚至留在農村的未婚女性也不願「下」嫁；農民的生活清苦她們自然是清楚的。挺拔健碩的阿金，和一般人印象中娶不到老婆的形象大相逕庭。對於自己娶印尼新娘的決定，阿金作了說明：「以前在外面時，交了不少女朋友。只是那時還年輕，沒認真想過結婚的事。回到鄉下後，要交女朋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有誰會甘心捨棄繁華的都會生活，跟我留在這兒過苦日子?!」阿金的苦楚決非庸人自擾。他的鄰居們最近傳說在台中上班的阿杰，家人也打算鼓勵他去印尼相親了。阿杰曾經交了好幾個女朋友，可是每回要帶她們回老家給父母看時，女方聽說阿杰家是種田的，又是客家人，都打了退堂鼓。阿杰最近又有了新女朋友，聽說正打算利用假期帶她回家。阿杰的父母早有再度被拒絕的準備，已和媒人說好，這次要是再不成，乾脆帶阿杰去印尼。阿杰的母親心疼兒子在婚姻上的坎坷路，悲憤地說：「鄉下人有什麼不好？我們鄉下子弟最老實。她們為什麼要這麼遭蹋人?! 我們有骨氣，不要看人臉色。娶不到，我們可以去印尼！」印尼新娘為飽受挫敗的農村失婚青年，帶來了新希望。

有關「外籍新娘」的分析與報導，常常以不同形式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媒體報導內容相當程度地反映了台灣人對這群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婦女的態度：來自異國的社會問題製造者。一主要媒體有了如下的描述：「這些台灣郎仍不顧一切的“南向”，帶回這些教育程度低落、乏味，甚至醜陋的東南亞女人。她們將來究竟會帶給台灣社會什麼社會問題呢？」「外籍新娘」與「台灣新郎」所建立的家庭，被視為兩個「沒水準」的人的結合，他們的後代，更被形容為「降低台灣人口素質」的因子。記者們紛紛提出先知般的呼籲：「他們勢必影響我們的人口素質。男女雙方都是教育程度低落、甚至是精神和身體有殘缺的劣質人口，將來他們所生的孩子將無法有良好的教育環境，對未來的人口品質的負面影響不可言喻。」